

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

蔡錦圖¹

The History and Editions of Catholic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Daniel Choi

論文摘要

本文是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回顧，特別是過去一個世紀，天主教中文聖經、新約和部分經卷的出版成果。

前言

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的聖經翻譯工作，可以回溯至元朝，儘管這時期沒有任何聖經譯本遺下。從 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已在他們的教理著述中撰有少量中文譯經成果。到了 18 世紀，更有兩部重要的譯經手稿（各自再有抄本）留下至今。從 19 至 20 世紀中葉，除了天主教首部完整的中文聖經《思高聖經》之外，現存的譯經數量也超過十項，而在 1960 年代《思高聖經》之後，中文譯經仍見成果。

本文以介紹 19 世紀之後的天主教中文聖經為要旨。由於篇幅所限，文中對每一譯經項目都只能略述，而所介紹的也僅限於曾見過的聖經譯本，並不包括聖經經文註釋、信理著述、彌撒書等曾引用或翻譯的經文。² 至於新約福音書合參本和聖經選輯本，只會在相關的譯者有進一步的聖經翻譯成果時才特別論述。³

過往關於中文聖經翻譯的著述，較為集中於新教，對於天主教譯經的論述較

¹ 感謝包智光（François Barriquand）神父對本文的意見，以及所提供的參考資料。

² 關於在經文註釋、信理著述、彌撒書、日課經或聖詠唱頌所用的中文聖經譯文，是一個相當有意義的課題，因為它可以反映中國天主教會如何理解和運用聖經的神學及禮儀。

³ 天主教傳教士在明末清初的譯經，有不少成果，其中也有可以歸入福音書合參的類型。到了清末民初，福音書合參本更多。例如，遣使會士包士傑（Jean-Marie Vincent Planchet, 生卒不詳）於 1909 年在北京出版了一部福音書合參，以及同年由耶穌會士巴鴻勳（Jules Bataille, 1856–1938）在天津出版了另一部福音書合參。還有慈幼會（Salesians）在 1941 年有一部《吾主耶穌的喜報》，也是福音書合參作品。

少，雖然不乏對有關史料的整理，但對這個課題仍需有更多探討。⁴ 本文嘗試縱覽天主教的中文譯經歷史，按照時序分述各項譯本（各附一段譯文以供參考），以此回顧整段歷史所反映的經驗。

在此必須承認，本文對於天主教中文譯經的回顧，只是浮光掠影，而且也受限於所見的版本，未必盡然述及。⁵ 即使是文中提及的聖經，其翻譯涉及的各論題，有許多地方值得再仔細研究，而這一點唯有祈盼於學者同道的貢獻。

（一）早期中文譯經的概述

1. 元代天主教會

在蒙古人統治中國的元朝期間，天主教傳教士來到中國。1245 年，當蒙古大軍進逼歐洲之際，羅馬教廷和法國國王分別派遣方濟會士到蒙古和林聘問，其中柏郎嘉賓（Giovanni da Pianô Carpine, c. 1180 – 1252）在回國後的拉丁文著述，提到中國人（可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據說擁有聖經和類似聖堂的建築。⁶ 佛蘭芒方濟會士魯不魯乞（Willem van Ruysbroek, c. 1220 – c. 1293）曾於 1254 年覲見憲宗，他的記載提到景教教士和聖經，但難以確定聖經是否已被翻譯成蒙古文或中文。⁷ 馬可·波羅（Marco Polo, c. 1254 – 1324）在 13 世紀的遊記，也

⁴ 關於天主教中文譯經的泛論，參梁雅明：「中文聖經譯本」條，載思高聖經學會編著：《聖經辭典》（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75）；思高聖經學會：《聖經簡介》（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81），頁 118–134；《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簡史》（香港：聖經協會，1991）；勞伯壘著，宋蘭友譯：「聖經中譯：一些觀察和反思」，載《神思》第 76 期（2008 年），頁 84–103。關於天主教中文譯經較詳盡的整理，參 Bernward Willeke, “Das Werden der chinesischen katholischen Bibel”, in Johannes Beckmann, *Die Heilige Schrift in den katholischen Missionen: Gesammelte Aufsätze* (Admin. der Neuen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wissenschaft, 1966), 124–138; Piet Rijks, *The History of the Bible in China*, 載《聖言之僕：陳維統神父晉鐸金禧紀念文集》（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96），頁 3–50。

⁵ 歷史記錄常有讓人困惑之處。例如，Giovanni Rizzi CRSP, *Edizioni della Bibbia nel contesto di Propaganda Fide: Uno studio sulle edizioni della Bibbia presso la Biblioteca della Pontificia Università Urbaoniana*, vol. III (Roma: Urban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36 的記述，提及巴黎外方傳教會在重慶曾有一部舊約和新約的選集，名為《舊新史略》，合共 970 頁。這項記載可能有誤，因為在羅馬教廷傳信部圖書館（Library of Propaganda Fide in Rome）所保存的是新舊約兩冊各 97 頁的著作，名為《古新史畧》，在對照譯文之後，應為晚清耶穌會士沈則寬的譯本（參下文及註 28）。下文所述的中文聖經版本，都盡可能經過查證，但若仍有疏漏之處，還望指點。

⁶ 柏郎嘉賓往訪蒙古的記述參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Viaggio a' Tartari di Frate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Milano: Edizioni “Alpes”, 1929)。

⁷ 關於魯不魯乞的傳記，近期的版本有 William of Rubruck,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1253–1255*, translated by Peter

有不少地方提到景教徒、基督徒和教會，記載蒙古可汗在節日傳召基督徒，要他們呈上四福音，並吩咐他們和朝臣公卿向這書焚香禮敬，虔誠獻吻。不過，僅從這些記述，較難確定聖經在元朝中國的情況。

當時最直接提及聖經翻譯的史料，是來自意大利方濟會士孟德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6–1328）的記錄。⁸ 孟德高維諾是中國第一個天主教教區的創始人，1294 年以教廷使節的身份抵達大都，獲准在京城設立教堂傳教，1307 年獲羅馬教廷委任為汗八里（今北京）總主教。孟德高維諾在寄回歐洲的信札中提到，他熟悉韃靼人日用的語言和文字（大概是指蒙古文），而且他已經以這種語言文字來翻譯整部新約與詩篇。不過，這些經籍現今都已不存於世，以致沒法得窺其貌。

2 · 明末清初天主教會

隨著蒙古人政權被漢人建立的明朝政府逐出中國，天主教傳教士由於新政權的閉關政策而被拒於中國的門外。直至 16 世紀，西班牙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來華。耶穌會是於 1534 年由依納爵·羅耀拉（Ignazio di Loyola, 1491–1556）創立，注重傳教、教育和學術研究。在對中國充滿傳教熱誠的期待下，沙勿略於 1552 年抵達廣州附近的上川島，可惜由於明朝政府正實行封禁海疆的政策，嚴格限制外國人入境。沙勿略不得其門而入，不久病歿於上川島。雖然沙勿略未能如願而逝，但他對中國福音化的理想，卻影響了後來的天主教傳教士。

為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奠定基礎的，是明朝末年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以及隨後而來的傳教士。當時的天主教傳教士以中文撰寫和翻譯了不少天主教教義著作，例如羅明堅於 1584 年在廣州刊行的《天主聖教實錄》，就是首部天主教要理中文著述，其中涉及天主教教理之處，即有經文的摘引。

不過，大體上，當時耶穌會士僅在個別著作中翻譯了部分聖經經句。其中一類是聖經經句的詮解，例如有利瑪竇的《天主實義》（1595 年初刻於南昌）、葡萄牙耶穌會士陽瑪諾（Manuel Dias junior, 1574–1659）的《天主聖教十誠真詮》（刊於 1642 年）等。另一類是聖經史實的描述，例如有西班牙耶穌會士龐迪我

Jackson, with David Morgan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Pub Co., 2009)。

⁸ 孟德高維諾的信札，現存意大利佛羅倫薩的勞倫圖書館（Laurentian Library）和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關於孟德高維諾的論述，參 J. De Ghellinck, s.j., “John of Monte-corvino: First Archbishop of Peking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n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vol. XVIII, No. 69 (Jan., 1929), 83–96。

(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 的《受難始末》(日期不詳, 1925 年土山灣有重刻本)、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 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1642 年初刻於北京, 共八卷, 記述耶穌生平) 等。

在這些聖經經句的摘引中, 葡萄牙耶穌會士陽瑪諾 (Manuel Dias junior) 和意大利耶穌會士利類思 (Lodovico Buglio, 1606–1682) 的中文聖經譯文最為豐富。陽瑪諾在 1636 年撰寫的《聖經直解》是福音書的註釋, 把福音書許多經文譯成中文 (北京初刻本十四卷, 書中附上索引; 本書另有官話節譯本)。利類思也翻譯過不少彌撒經書和祈禱書, 載錄了中文的經文, 例如《彌撒經典》(1670 年印共五卷)、《司鐸日課》(1674 年刻於北京)、《聖母小日課》(1676 年刻於北京)、《已亡日課經》(日期不詳) 等。⁹

從 16 至 17 世紀期間, 天主教的聖經翻譯主要是涉及教會禮儀的應用, 例如在講壇上的宣講、福音信息、在日課經中的聖詠吟唱, 以及對經唱頌所引用的經文等。¹⁰ 不過, 對於中文聖經完整經卷的翻譯, 尚待下一個世紀的成果。

(二) 清初的中文譯經

1. 白日昇譯本

現存最早的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 是 18 世紀初由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白日昇 (Jean Basset, 1662–1707)¹¹ 翻譯的新約部分。白日昇約 1662 年生於法國里昂, 1684 年進入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學院 (Séminaire des Missions

⁹ 明清天主教來華傳教士文獻的彙集, 包括上述經籍的印本, 主要見於學者 (特別是方豪神父) 從 1960 年代開始整理的著述, 包括吳相湘編:《天主教東傳文獻》(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1965); 吳相湘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 3 冊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1966); 吳相湘編:《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 6 冊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4); 鍾鳴旦 (Nicolas Standaert) 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 5 冊 (台北:方濟出版社, 1996); 鍾鳴旦與杜鼎克 (Adrian Dudink) 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12 冊 (台北:利氏學社, 2002) 等; 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及文獻彙編》, 5 卷 (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 2003); 鍾鳴旦等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26 冊 (台北:利氏學社, 2009)。

¹⁰ 關於天主教傳教士在 17 世紀的中文聖經翻譯歷史, 參 Nicolas Standaert, "The Bible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in *The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edited by Irene Eber, Sze-kar Wan, Knut Walf, in collaboration with Roman Malek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Nettetal; Distribution: Steyler, 1999), 31–54。關於明清耶穌會士的中文聖經譯述, 參徐宗澤編:《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中華書局, 1948), 頁 17–104, 「卷二 聖書類」的簡介。

¹¹ 「白日昇」的寫法是根據當時檔案所載用詞。關於白日昇抄本的論述, 參蔡錦圖:「白日昇的中文聖經譯本及其對早期新教譯經的影響」, 載《華神期刊》, 2008 年 6 月, 第一期, 50–77, 其中註 3、5–7 列出近期討論這抄本的論文。

Étrangères de Paris)，1685 年以傳教士的身分前往暹羅。1689 年，白日昇到達廣州，在 1692 至 1693 年間負責江西省的教務。從 1702 年開始，他在四川的西南部傳教。1707 年，白日昇因禮儀之爭而離開四川，同年 12 月卒於廣州。

1704 年復活節，當時白日昇正在四川，他為一個中國人徐若翰 (Johan Su, (?)-1734) 施洗。¹² 從那時候開始，白日昇與徐若翰把新約的瑪竇福音至希伯來書第一章，從拉丁文聖經翻譯成中文的文言語體。¹³ 從 1704 年至 1707 年 12 月期間，他們翻譯了新約的大部分。或許是由於沒有完成的關係，這部譯本並沒有出版。

白日昇在四川的中國同工李安德 (André Ly, 1692-1774)，後來也提及這部聖經的翻譯概況。¹⁴ 白日昇的這部譯本現今只餘三份屬於 18 世紀的抄本，分別存放於羅馬和英國 (劍橋和倫敦)。除此之外，還有從這些抄本再輾轉抄錄的抄本。現今在羅馬卡薩納特圖書館 (Biblioteca Casanatense) 中所存的可能是早期抄本 (或是原稿)，那是順著書卷次序翻譯的，顯示最初的翻譯是按此次序的。雖然現今難以判斷這部抄本的抄寫日期，但它可能是在白日昇逝世之後不久完成的，故此即使不是最早期的原稿，也是相當接近的。¹⁵

以「麻耳谷攸編耶穌基督聖福音」(即馬爾谷福音)一章 1 至 8 節為例：¹⁶

神子耶穌基督。福音之始。如依賽先知書攸云。我即遣吾使先爾。預備爾道者也。若翰在曠野付洗。而宣痛悔致赦罪之洗。且出就之。如達舉方。與柔撒冷眾人也皆自告己罪。而受其洗于若丹河。若翰乃衣駱駝之毛。而皮帶圍其腰。食蚱蜢與野蜜。其講道云。後我來者。能于我。我非堪當伏釋履綦。我洗汝曹以水。其洗汝以聖風。

¹² 在白日昇致修會的四封法文信函中 (1704 年 4 月 24 日, 9 月 19 日, 1705 年 7 月 13 日, 1706 年 8 月 23 日) 均有提及徐若翰。感謝包智光神父提供以上信函, 他也提供了羅馬卡薩納特圖書館 (Biblioteca Casanatense) 所藏白日昇譯稿早期版本的覆印本。關於白日昇和徐若翰的譯經工作, 參 François Barriquand, "First Comprehensive Transl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Chinese: Fr Jean Basset (1662-1707) and the Scholar John Xu", in *Societas Verbi Divini: Verbum SVD* 49 (2008): 91-119。

¹³ 對於白日昇譯本的中文語體, 筆者按所見的譯文, 推測白日昇譯本是以文言語體作為翻譯準則, 但偶然混雜白話或地方用語。以上推測, 尚需論證。

¹⁴ 相關敘述, 見於李安德於 1751 年 3 月 19 日的日誌。參 Andreas Ly, *Journal d'André Ly, Prêtre Chinois, Missionnaire et Notaire Apostolique, 1746-1763*, ed. by Adrien Launay (Paris: Alphonse Picard, 1906; Hongkong: Imprimerie de Nazareth, 1924 年再版)。

¹⁵ 包智光神父告知, 在美國三藩市馬愛德檔案館 (Malatesta Archives in San Francisco) 由徐若翰的手書顯示, 他的字體與羅馬卡薩納特圖書館和劍橋的抄本是相同的, 故此兩者是由徐若翰抄寫。筆者從圖片中在比較兩者的字體之後, 認同這一觀點。

¹⁶ 這段經文是取自在羅馬卡薩納特圖書館中所存的抄本。原書沒有分節。引文的標點符號俱按原文。

白日昇譯本的譯名方式，是以「神」字翻譯聖號。1704 年，羅馬教廷決定批准「天主」一詞的譯法（以後在 1715 年及 1742 年重申），但暫時仍未嚴厲禁止用「神」一字的譯法。故此在四川的傳教士會採用「天主」和「神」的譯名，直至 18 世紀中葉。

白日昇的早期譯本中，有兩部是把福音編成合參形式的抄本，現分別存於劍橋大學英國聖經公會圖書館和大英圖書館。這兩部合參本應該是由徐若翰在較後期編寫的。白、徐的這兩份抄本都是把四卷福音書以合參的形式編輯，而宗徒大事錄及保祿書信是按照經文次序翻譯的，直至希伯來書第一章。

在大英圖書館的白日昇手稿，是由一位東印度公司職員於 1737 年在廣州發現的，將其複製並且呈獻給倫敦皇家學會會長漢斯·斯隆（Hans Sloane, 1660–1753）爵士，再轉送給大英博物館（今大英圖書館的前身），故此這份手稿現稱為《斯隆抄本 3599 號》（Sloane MS #3599）¹⁷。1801 年，新教公理會牧師莫斯理（William Moseley，生卒不詳）在大英圖書館留意了白日昇的手稿。莫斯理試圖促使把它出版，卻不成功。英國聖經公會等機構也認為在出版上有實務的困難。1805 年，新教的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在來華之前得悉有這份抄本，於是與粵籍助手容三德（Yong Sam-tak 音譯，生卒不詳）將其謄抄下來，成為他後來翻譯中文聖經時的參考資料。馬禮遜和另一位英國浸禮會傳教士馬殊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在翻譯聖經時，都曾參考這份抄本，但他們始終不知道它的譯者是誰。¹⁸新教中文譯經歷史的開端，與天主教的譯經成果有深切的關係。

2· 殷弘緒的《訓慰神編》

1730 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Franç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在北京出版《訓慰神編》，正文載錄「聖多俾亞古經原本」（即多俾亞傳），為中國天主教會第一部出版的聖經單卷版本。¹⁹

¹⁷ 對於這部抄本，早期較重要的討論參 A. C. Moule, "A Manuscript Chinese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British Museum, Sloane 3599),"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1 (Apr., 1949), pp. 23–33。

¹⁸ 筆者所見過的白日昇其它抄本，除了馬禮遜帶來中國的一部抄本之外，還有英國聖經公會在上海的駐華代表文顯理（George H. Bondfield, 1855–1925）複製的一份抄本（現存劍橋大學圖書館），以及思高聖經學會的一份抄本。此外，在文獻中提過有其它抄本，但已不存。參蔡錦圖：《白日昇的中文聖經譯本及其對早期新教譯經的影響》，67–71 對各現存抄本的介紹。

¹⁹ 筆者只見過 1872 年慈母堂的重刊覆印本，封面刊載：《訓慰神編／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主教亞弟盎郎准慈母堂重梓》。這部覆印本見於周燮藩主編：《東傳福音》，載「中國宗

3 · 賀清泰譯本

在清初較完整的另一部聖經譯本，是由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所譯。賀清泰在 1770 年來華，精通中文和滿文。他根據拉丁文聖經，以北京官話翻譯了一部聖經附註釋，加上經訓，題為《古新聖經》。《古新聖經》簡單通俗，偶有北方俚語，編排方式與拉丁文聖經不盡相同。現存抄本不知是否全帙，缺了雅歌及大部份先知書，卻是在《思高聖經》之前接近最完整的天主教聖經譯本。²⁰ 當教廷得悉賀清泰的這部譯本時，雖然加以稱許，卻禁止出版。

《古新聖經》載有天主教最早期的中文舊約，以「眾王經第二卷第二編」1 至 2 節（即撒慕爾紀下第二章 1 至 2 節）為例：²¹

後來達味求天主的旨意說·我能去如達斯族的一座城否·天主答應·只管去·達味又問·往那裡去呢·答說·往黑栢隆去·因此達味同他兩個妻子耶匝拉耶耳地方的亞既諾娃、加耳默落山上那巴耳的妻子·亞必加意肋·即刻去了·達味還領他一齊有的人·並他們的全家·住在黑栢隆管的城庄子·

在此再引述另一段新約的經文，是「聖史瑪爾谷紀的萬日畧」（即馬爾谷福音）一章 1 至 8 節：²²

按瑪拉濟亞、依撒意亞、二位先知、經書上紀的天主子耶穌、基利斯督萬日畧的起頭、瑪拉濟亞、經上天主聖父、向聖子說、如今我遣我

教歷史文獻集成」（合肥：黃山書社，2005），第三冊，頁 91–124。

²⁰ 關於賀清泰的譯經，參 Kim Dongso, "P. Louis de Poirot, S. J., the first translator of the Bible into the Chinese and Manchu languages," in *Altai Hakpo* (Journal of the Altai Society of Korea) 6 (2003): 15–39。據徐宗澤編：《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 18–20，賀清泰的《古新聖經》之書卷有：有造成經之總論二本、救出之經一本、肋未子孫經一本、數目經一本、第二次傳法度經一本、若耶穌之經一本、審事官錄德經一本、眾王經書序四本、如達斯國眾王經二本、厄斯大拉經序一本、多俾亞經一本、祿德經一本、若伯經序一本、厄斯得肋經一本、如第得經一本、達味聖咏三本、撒落滿之喻經一本、智德之經一本、厄格肋西亞斯第個四本、達尼耶爾經書一本、依撒意亞先知經一本、瑪加白衣經序二本、聖史瑪竇萬日畧一本、聖史瑪爾谷萬日畧一本、聖史路加萬日畧一本、聖若望聖經序一本、諸德行實一本、聖保祿、聖伯多祿、聖亞各伯、聖如達書扎三本、聖若望默照經一本。

²¹ 原書沒有分節。本段是根據香港思高聖經學會的攝影本。

²² 原書沒有分節。本段是根據上海徐家匯圖書館的版本。

的天神、在你前、與你預備路、依撒意亞經上紀的、曠野內、聽見有呼號的聲音說、人人皆當預備天主的道、與他修直路、本來耶穌初出講道前、有若翰在曠野洗眾人、也傳痛悔的洗、為得罪之赦、眾人都從如德亞地方、日露撒冷城出來、到他跟前、告自己的罪、在若耳當河受他的洗、若翰穿駱駝毛的衣裳、腰繫皮帶、所食不過些螞蚱、及野外的蜂蜜、講道時常說、有比我剛強的在我後來、我還不敢伏地釋他的鞋帶、我用²³洗你們、他要以聖神洗你們、

賀清泰也翻譯了滿文的聖經，包括舊約大部分，以及次經、瑪竇福音和宗徒大事錄。

(三) 清中葉至民國的中文譯經

1. 清中葉的譯經

明清兩代天主教傳教士譯經的數量不多，大多是私人的譯本，只有聖經部分的翻譯，以作參考，甚少流傳。

在 18 世紀初，方濟會士梅述聖 (Antonio Laghi da Castrocaro, 1668–1727) 翻譯了創世紀和部分出谷紀，另一名方濟會士麥傳世 (Francisco Jovino, 1677–1737) 修訂了上述部分譯文，並且翻譯至民長紀 (顯然也包括多俾亞傳與達尼爾)，但他們的譯本沒有出版或保存。到了 19 世紀，中國教士也有參與譯經的工作，例如王多默 (Thomas Wang, 生卒不詳) 先後於 1875 年和 1883 年翻譯了官話的四福音和宗徒大事錄。另外，辛方濟 (Francis Xin, 生卒不詳) 也翻譯了文言的四福音譯本，可是這些譯本也沒有問世。²⁴

事實上，由於傳教士的聖經翻譯以文言為語體，信眾也不易理解，故此傳教士也會以淺白的筆觸，撰述聖經的內容。例如，德國聖言會 (Societas Verbi Divini) 赫德明 (Joseph Hesser, 1867–1920) 神父所編寫的《古經略說》和《新經略說》，就是簡明扼要地概述聖經，有助信徒理解聖經的內容，而赫德明的《主日瞻禮聖經》也有聖經的引述。

到了 19 世紀下半葉，中文聖經的翻譯漸漸增多。這段期間的中文聖經翻譯，

²³ 原書可能缺了「水」字。

²⁴ 以上綜述，參 Jost O.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9), 26–28。另參思高聖經學會著：《聖經簡介》，頁 123–124。

差不多都是由巴黎外方傳教會和耶穌會的傳教士所進行的。其中大多數譯本包括福音書和宗徒大事錄，只有少數譯本則包括新約的其它部分。以下按照譯經者最早出版的譯本為次序，分述各項。

2· 李問漁

現存晚清最早出版的天主教聖經譯本，可以追溯至耶穌會士李問漁(Laurent Li Wen-yu, 1840–1911，即李杅)的譯著。李氏是晚清著名的天主教學者，曾任震旦學院院長，南洋公學教師，先後創辦並主編天主教的中文報紙《益聞錄》和《聖心報》。

1887年，李問漁的《宗徒大事錄》出版。²⁵ 1897年，他的《新經譯義》由上海土山灣慈母堂出版，這卷書雖以「新經」為名，實際上只有四卷福音書。²⁶ 換言之，李氏的譯經成果有福音書和宗徒大事錄，而以上都是文言譯本。

以1897年《新經譯義》「聖馬爾谷福音」一章1至8節為例：

¹耶穌基利斯多。天主子也。其福音之始。²如先知依撒意記云。予遣使者。至汝面前。先汝備汝道。³有聲呼於野曰。宜備主道。修直厥徑。⁴按若翰授洗於野。傳悔洗禮。用邀罪赦。⁵舉如德亞境。與日路撒冷人。俱出。自訟其罪。受若翰洗於若爾當河。⁶若翰衣駝毛。革帶束腰。食蝻蝗野蜜。施訓曰。⁷有權能大於我者。後我而來。雖俯伏解其履帶。予亦不能當。⁸予以水洗汝。渠則以聖神洗汝也。

3· 沈則寬

1890年，耶穌會士沈則寬(Matthias Sen, 1838–1913)以官話翻譯了《新史畧·宗徒事畧》，在土山灣出版。²⁷ 本書合共一冊，上半部分有七卷，以福音書合參的方式編撰耶穌生平；下半部分有一卷，為宗徒大事錄的節錄。沈則寬在本書序言中說，所謂「新史」，是指「耶穌實錄」。這是福音書合參和宗徒大事錄的官話節錄本，附有地圖和插圖。

²⁵ 李問漁譯：《宗徒大事錄》(上海：土山灣慈母堂，1887)。江南主教倪准簽署的教廷出版許可，附插圖。本書於1897年、1907年和1914年重印。

²⁶ 李問漁譯：《新經譯義》(上海：慈母堂，1897)。江南主教倪准簽署的教廷出版許可。本書於1900年和1907年重印。

²⁷ 沈則寬譯：《新史畧·宗徒事畧》(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890)。

本書的經文沒有分節標示，以「新史畧」卷一第一章「天神報若翰將生」首三行的經句為例，這是摘錄自路加福音一章 5 至 7 節：

黑落德做如德亞國王的時候。在山裡有一個司教。名字叫匝加里亞。他的妻子。名字叫依撒伯爾。夫婦兩個。都是好人。全守天主教的規誡。但是年紀老了。還沒有兒女。為此常求天主。賞賜一個兒子。

同年，沈則寬也以官話翻譯和出版《古史畧》，把舊約的歷史分六卷記述。《古史畧》和《新史畧·宗徒事畧》合併成為兩冊，名為《古新史畧》。²⁸

沈則寬另撰有《古史參箴》一書，以近似小說的淺白語體，把舊約的故事改寫。²⁹

4· 德如瑟

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德如瑟（Joseph Dejean, 1834–1901，另名「德雅」）翻譯了文言《四史聖經譯註》，並予以付梓。這部譯本是參照拉丁文聖經翻譯四卷福音書，瑪竇福音的完成日期是在1892年，而其餘三卷是在1893年完成和出版的，並在經文的頁頂印有註解，為中國天主教會最早出版的四卷福音書（比李問漁的《新經譯義》尚早四年）。³⁰

以馬爾谷福音（卷二）一章 1 至 5 節為例：

^一天主聖子。 基思督者。 耶穌喜報之始。^二按宜撒義先知紀內所云。今哉。予遣吾使。汝前先驅。豫開汝途。^三於曠野中。大呼者之聲曰。 上主之途。爾宜豫開。厥徑宜直。^四昔於曠野。若翰授洗。傳悔過贖罪之洗禮。以望罪赦。^五時。茹德各地。暨瑯露撒陵眾民。咸詣厥前。自首其罪。在浴當河內。受洗於若翰。

²⁸ 沈則寬的《古新史畧》在民國年間多次由重慶曾家巖聖家書局出版，筆者所見的版本有 1921 年，另有記錄提到 1923 年在上海土山灣，以及 1929 年在重慶曾家巖聖家書局也有出版。然而，筆者不能確定《古史畧》和《新史畧·宗徒事畧》的合併出版，最初是在何時。

²⁹ 沈則寬：《古史參箴》，5 卷（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11）。本書在 1961 年由台北光啟出版社再版。

³⁰ 德如瑟譯註，梅志遠評閱，賴玉宏敬訂：《四史聖經譯註》（香港：納匝肋靜院，1893）。粵東監牧邵主教於 1891 年允，香港主教若望高於 1892 年准。

5 · 馬相伯

馬相伯(1840–1939)是中國著名的天主教徒和學者，於1862年加入耶穌會，研習神學，並任神父和徐匯公學校長，至1876年退出耶穌會。馬氏以後參與政治、外交和教育工作，至1917年離開公職，退隱上海徐家匯土山灣，譯著天主教書籍。

1919年，馬相伯出版《新史合編直講》³¹，把新約的四卷福音書重新整理，按照事件先後排列，這部分是以文言撰譯的。本書另有註解，是以白話撰寫的。不過，《新史合編直講》並不是嚴謹的福音書翻譯。³² 隨後，馬相伯在30年代再以文言翻譯福音書四卷《福音經》，題為「救世福音」或「對譯羅瑪監本四聖史」，1937年完稿，為當時的南京主教于斌審核，准予刊印，但直到1949年才出版。

33

在1949年的《福音經》中，有詳盡的序言，介紹這譯本的翻譯取向。每部福音書前有一短文，簡介該部福音書的架構主旨。

以「福音經 記者馬爾谷」(即「馬爾谷福音」)一章1至8節(1949年版)為例：

¹耶穌基利斯多，天主子，其福音之始布也。²一如先知依撒亞記載曰：茲余遣我天神居爾顏行，先爾以平除爾道。³有聲號於曠野：修治主途，直繩其徑。⁴若翰於曠野授洗，并講明受洗以怨艾自懲者，得邀罪過之赦宥。⁵舉凡如德亞之地，與協路撒稜之眾，出就之於若爾當河而受其洗，呈訟已罪焉。⁶顧若翰衣則駝毛，皮帶圍腰，蝗蟲與野蜜是食，常訓話曰：⁷有一後我而來者，實勝於我：我不敢俯伏以釋其屨綦。⁸我洗爾儕僅以水，是將洗滌爾儕以聖神焉。

由於《福音經》譯成(1937年)和出版(1949年)之際，正值中國政局風

³¹ 馬相伯的《新史合編直講》是譯自 Andrea Mastai Ferretti (1751–1822) 的 *Les Évangiles Unis, Traduits et Commentés*。

³² Hubert W. Spillett,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75), no. 236 (以下稱為 Spillett) 的記錄提及，1923年馬氏以文言撰譯福音書合參，在上海出版。然而，英國劍橋圖書館並沒有這一部譯本，而且筆者再見不到有任何地方提過這一部譯本，所以懷疑 Spillett 的記錄有誤。

³³ 馬相伯譯，趙爾謙校，相伯編譯館編：《救世福音》(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書首內頁載有「對譯羅瑪監本四聖史 一九三七年三月南京主教于准刊」。Spillett, no.239 誤把本書記為1948年出版。在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頁585–586中，載有一篇1936年《救世福音對譯》的序言，略短過1949年《救世福音》的序言，但其基本文詞和概念相同。

雲色變之時，影響了它的流通。此外，《福音經》按照四福音逐字翻譯，文辭典雅，但對於教育程度不高的受眾，卻顯然難以通行。³⁴ 在此再以若望福音一章 1 至 5 節為例，顯示其用辭之深邃：

「厥始即有真言物爾朋，真言即在天主所，而真言即天主也。^一斯所厥初之在天主所者。^二萬有繇斯以成無斯，則無受造者得造成。^三在斯方有生命，生命乃人性之光明^五光明明於幽暗，而幽暗勿之承受。

6. 何雷思與馮嘉祿

1913 年，香港納匝肋靜院出版了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何雷思 (Marie Louis Félix Aubazac, 1871–1919)³⁵ 的《聖保祿書翰》，包括文言的保祿書信和公函。³⁶ 這是第一部天主教會翻譯並出版的聖保祿及其他宗徒公函的譯本。1927 年，何雷思與馮嘉祿的再版名為《聖保祿書翰：並數位宗徒函牘》。³⁷ 書首附由何雷思神父所撰的序言，而每章經文之後也有註解。

以聖若望宗徒第一書一章 1 至 3 節為例：

「元生之道。自初已有。吾耳聞之。吾目觀之。吾謹思之。吾手捫之。^一元生既顯。我見之為證。今我報常生於爾。常生與父共在。顯著於我。^二我以所見所聞。傳報於爾。使爾與我以心相交。亦使吾儕。與父及其子耶穌基利斯督。均得相交也。

7. 蕭靜山

1918 年，耶穌會士蕭靜山 (Joseph Hsiao Ching-Shan, 1855–1924) 出版了國語的四福音，³⁸ 隨後於 1922 年由直隸東南耶穌會 (獻縣) 出版《新經全集》初

³⁴ 關於馬相伯的譯經，參方豪：「馬相伯先生與聖經」，載《東方雜誌》，復刊 9 卷 7 期 (1976 年)，頁 35–40；林雪碧：「馬相伯與近代中國天主教會本地化的關係」，《神思》第 47 期 (2000 年 11 月)，頁 43–64。

³⁵ Marie Louis Félix Aubazac 的中文名字在坊間有譯作「歐聲石」，但應為「何雷思」。本書的序言也註有「何雷思」一名。

³⁶ 何雷思譯：《聖保祿書翰》(香港納匝肋靜院，1913)。Spillett, no.230 把本書註為 1917 年出版，但筆者在劍橋大學圖書館沒有尋得 1917 年有此版本，故此 Spillett 的記錄可能有誤。

³⁷ 何雷思與馮嘉祿合譯：《聖保祿書翰 並數位宗徒函牘》(香港：香港納匝肋靜院，1927)。

³⁸ 筆者未曾見過這一部福音書，但有記錄提及 1918 年譯本是四卷福音書，以一冊釘裝，而它是由耶穌會士巴鴻勳的通用語言譯本轉譯而來 (參本文註 3)。參 Rizzi, *Edizioni della Bibbia*

版。本書是第一部天主教出版的新約全書，譯文簡潔通順，根據希臘文修訂，附有註釋。蕭靜山的國語新約譯本的出現，正值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際，迅即成為中國天主教當時較通行的譯本，以後多次再版。³⁹ 1948 年和 1956 年，蕭靜山譯本由台中光啟出版社再版，以後重印。⁴⁰

以聖馬爾谷福音一章1至8節為例：

¹天主（聖）子耶穌基督福音的來歷。²按照先知依撒意亞記載的，說「你看！我打發我的天神，在你面前，叫他在你頭裏，預備你的道路。³在曠野有人聲呼號說：你們應當預備主的道，把他的路徑，修直了。」⁴若翰來，在曠野裏授洗，傳悔改的洗禮，為得罪赦。⁵猶太各地方的人及耶路撒冷的人，都出來到若翰那裏，承認自己的罪，在若爾當河，受他的洗。⁶若翰穿的是駱駝毛的衣裳，腰裏繫着皮帶，喫的是飛蝗野蜜。他講道理說：⁷「有一位比我更強勝的，在我以後來，我即便給他跪下解鞋帶子，也當不起。⁸我不過是用水洗你們，他要用聖神洗你們。」

1981年11月，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會議決定印刷《新經全集》，這是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近代最早使用的中文聖經。⁴¹

8 · 卜士傑

1923 年，香港納匝肋靜院出版了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卜士傑（Pierre Bousquet, 1874–1945，另名「卜多祿」）的文言《新經公函與默示錄》，包括新約的公函和若翰默示錄，附有每卷書的序言和註解。⁴²

以聖若望第一書一章1至3節為例：

nel contesto di Propaganda Fide, 1126 & n. 9。1932 年，巴鴻勳根據蕭靜山的譯文，出版了《新經合編》。然而，筆者始終未見過巴鴻勳的以上聖經譯述，所以不能比較確定。

³⁹ 蕭靜山譯：《新經全集》（獻縣：直隸東南耶穌會，1922）。筆者還見過 1936 年的版本，為獻縣第六次排印的版本。這一版的資料見 Spillett, no. 492。蕭靜山在 1922 年的譯本於 2007 年由拾珍出版社再版，附於《新約聖經——六合一譯本》（香港：拾珍出版社，2007）中，由於是新教的出版著作，故此改動了聖名和人名、地名的譯法。

⁴⁰ 蕭靜山譯：《新經全集》（台中：光啟出版社，1956）。1957 年的再版是由台中區監牧蔡文興准。

⁴¹ 參張士江：「當代中國教會的聖經推廣與福傳」，載《鼎》2007 年春季號（第 27 卷，第 144 期）。

⁴² 卜士傑譯：《新經公函與默示錄》（香港：納匝肋靜院，1923）。Spillett, no. 484 把本書歸類為國語譯本，但顯然並不正確，因為本書是文言語體。

¹惟論起初所常在者。吾耳所聞。吾目所睹。吾所觀之。吾手所摸生命之言。²蓋生命者已經顯現。及我得見而立證據。而且對爾報告與父同在。亦顯於我常生。³乃目所睹耳所聞者。我報於爾。使爾亦與我得相交。並我等相交與父及其子耶穌基督者。

9. 蕭舜華、李山甫、申自天和狄守仁

從 1940 至 1943 年間，耶穌會士蕭舜華（生卒不詳）先後以國語翻譯和出版了瑪竇福音、馬爾谷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單行本，⁴³ 跟著在 1941 年出版了宗徒大事錄，⁴⁴ 以及在 1943 年出版了聖保祿書信集。⁴⁵ 以蕭舜華的宗徒大事錄一章 1 至 3 節為例：

¹德阿斐祿台鑒，我在第一部書內，已經將耶穌的一切行為和教訓，陸續向你說了一番，²直到他因聖神，將他的訓言授於他所選的宗徒，然後升天的那日為止。

³在他受難以後，又活着現示給他們，給了他們許多證據；四十天之久，向他們現示，對他們談論天主的國。

蕭舜華在 1941 年另撰有一部《青年聖經讀本》，以較簡略的篇幅和用語，把整部聖經的內容節錄整理。⁴⁶

1949 年，耶穌會士李山甫（György Litványi, 1901–1983）、申自天（René Archen, 生卒不詳）、狄守仁（Édouard Petit, 1897–1985）和蕭舜華共同翻譯了《新約全書》，並予以付梓⁴⁷。這部譯本以國語翻譯新約聖經，盡量保留希臘語的風格，強調文筆的優美，而其譯文與蕭舜華之前的譯文略有不同。

以 1949 年的聖馬爾谷福音一章 1 至 8 節為例：

⁴³ 以上三卷福音書的單行本是在 1940 年出版的。參 Rizzi, *Edizioni della Bibbia nel contesto di Propaganda Fide*, 1132 的記述。

⁴⁴ 蕭舜華譯：《宗徒大事錄》（天津：崇德堂，1941）。公教叢書委員會主編。1941 年 4 月 6 日在天津發出的教廷出版許可。註釋置於書頁左側。

⁴⁵ 蕭舜華譯：《聖保祿書信集：俘擄時期書信集》（天津：崇德堂，1943）。1942 年 2 月 2 日在天津發出的教廷出版許可。

⁴⁶ 蕭舜華譯：《青年聖經讀本》（天津：崇德堂，1941）。

⁴⁷ 李山甫、申自天、狄守仁、蕭舜華合譯：《新經全書》（天津崇德堂發行／北平獨立出版社印行，1949）。趙化民主教准。在 1955 至 1956 年間，他們以單冊印行宗徒大事錄和羅馬書，有關記錄，見 Spillett, no. 543。李山甫等在 1949 年的譯本，於 2007 年由拾珍出版社再版，附於《新約聖經——六合一譯本》中，由於是新教的出版，故此改動了聖名和人名、地名的譯法。

¹天主子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²依照依撒意亞先知書上所記載的話：「看哪！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給你修築道路。³在曠野裏有呼喊者的聲音：『預備主的道，修平祂的路吧』」！⁴施洗的若翰在曠野裏出現了，宣傳悔改的洗禮，以獲得罪過的赦免。⁵猶太全地區和耶路撒冷的民眾，都到他那裏去，承認自己的罪過，由他的手在若爾當河裏受洗。⁶若翰穿着駱駝毛的衣服，用皮帶束着腰，他吃的是蝗虫和野蜜。⁷他這樣宣傳說：「比較我強壯的那位，緊跟着就來，彎腰給祂解鞋帶子，我也當不起。⁸我用水洗了你們，祂却要用聖神洗你們」。

在上述譯者中，李山甫幾乎同時也有中文聖經的譯本分冊，但其譯文與 1949 年的新約僅有極少量的差異，基本上是相同的。⁴⁸

10 · 吳經熊

民國時期，較有特色的天主教聖經譯本是吳經熊（John Wu Ching-hsiung, 1899–1986）的譯本。吳經熊是浙江寧波人，著名法學家，先後在歐美各國進修，歷任東吳大學法學教授、上海特區法官與法院院長、南京政府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等要職，也是著名的天主教學者。吳經熊在 1938 年開始翻譯聖詠集，是年冬天呈予蔣介石，蔣氏遂要求吳經熊翻譯新約。此後，蔣氏修訂了吳氏翻譯的新約和聖詠集，而在吳氏所藏的蔣氏修訂本原稿中，還詳細記錄了蔣氏的修訂意見。⁴⁹ 吳氏在譯經期間，多次與方豪（1910–1980）神父書信往還及面晤，相詢譯經之事，在 1944 年後兩人毗鄰而居，有助吳氏的翻譯。⁵⁰

吳經熊的《聖詠譯義》（1946 年初稿，1975 年修訂，多次再版）以文言詩體

⁴⁸ 筆者見過的是李山甫譯：《瑪爾谷傳的福音》、《路加傳的福音》和《聖保祿書信集（羅馬 加拉達）》，三書都是由范存惠校閱（天津：崇德堂，1948）。三書的譯文與 1949 年《新約全書》之間的差異相當微小。筆者不確定李山甫是否尚有其它譯本。

⁴⁹ 參秦孝儀編：《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1~6）（台北，1986 年影印本）；《蔣介石日記》，1945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8 日、12 月 11 日等。在《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中，包括新約和聖詠的譯稿和修改，書中以毛筆字的形式撰寫經文，附有蔣介石的圈點修訂。吳經熊的《超越東西方》第十八章也提及他翻譯聖經（主要是聖詠集）的點滴，本書的英文原書是 John C. H. Wu, *Beyond East and West*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51)，中譯見吳經熊著，周偉馳譯：《超越東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⁵⁰ 關於這段經過，參方豪：「吳德生先生翻譯聖經的經過」，載《方豪六十自訂稿》（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下冊，頁 1977–1978；李東華：「方豪神父與民國天主教會」，《臺大歷史學報》33（2004 年），頁 261–313。

的方式，翻譯聖詠集。⁵¹ 跟著，吳經熊翻譯的《福音。附：宗徒大事記》（1949年）⁵²和《新經全集》（1949年，附教宗於1948年的代序）⁵³ 在香港出版，同樣是翻譯成文言文，部分以詩韻的形式，以後多次再版。

吳經熊的譯文是以文言翻譯，而且在書末附有大量註釋。以馬爾谷福音一章1至8節為例：⁵⁴

¹天主聖子耶穌基督福音之濫觴。²正如意灑雅先知書之所記云：

『吾遣使者、以先啟行；

為爾前驅、備爾行程。』

³『曠野有人、揚聲而呼：

為主清道、正直其途。』

⁴應乎是、有如望者施洗於曠野、而傳懊悔之洗禮、用滌宿罪。⁵猶太全境及耶路撒冷居民、相率出謁如望、自承其罪、而受洗於約但河中。⁶如望身被駝毛、腰束革帶、食則蝻蝗野蜜；⁷宣於眾曰：『有一後我而來者、德能遠超我上、吾雖俯而解其履帶、亦有未稱。⁸吾洗爾以水、彼將洗爾以聖神矣。』

11 · 上海耶穌會徐匯總修院

1953年，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了耶穌會徐匯總修院翻譯的《新譯福音初稿》，⁵⁵ 同年在香港出版，⁵⁶ 兩者的排版方式是完全一樣的。這是一部白話語體的福音書譯本，根據羅馬聖經學院梅爾克氏的希臘拉丁鑒定本譯出，對於拉丁文譯本與希臘文聖經不合之處，均按希臘文改正。⁵⁷

⁵¹ 吳經熊譯：《聖詠釋義初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蔣介石手訂、田耕莘題。關於這部聖詠集，參蘇其康著，余慧珠譯：「吳經熊中譯聖經《聖詠集》裏的上主形象」，載《中外文學》第30卷，第7期（2001年12月），頁4-32。

⁵² 吳經熊譯：《福音。附：宗徒大事記》（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49）。

⁵³ 吳經熊譯述：《新經全集》（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49）。田耕莘題，附「陸院長審閱／于總主教簽准證」、「教宗庇護十二世序」、「教宗嘉獎吳經熊氏新譯聖經（代序）」、「教廷傳信部部長傳樞機序」。

⁵⁴ 以下標點及分段方式是按原書。

⁵⁵ 徐匯修院譯：《新譯福音初稿》（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53）。本書於1953年8月15日由上海徐匯總修院敬獻「中華聖母無玷之心」。

⁵⁶ 徐匯修院譯：《新譯福音初稿》（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1953）。附地圖、附註及參考。本書有1953年在香港發出的教廷出版許可。關於這譯本，筆者還見過同年有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的瑪竇福音，故此可能也有其他分冊的版本。

⁵⁷ 有關介紹，見於1953年在上海出版的《新譯福音初稿》的「凡例」。

在序言（1953年8月10日）中提到翻譯福音書的取向：

……因此，福音一書，流傳至廣，譯本極多，我國公教譯本著名的有：李問漁的新經譯義、馬相伯的福音、吳經熊的新經全集，可惜都是文言的，未能適用於一般讀者；語體文的譯本也有多種，其中較通行的有，獻縣出版的新經全集，天津崇德堂出版的新經全集；但獻縣本多當地土語，不免失之俚俗，天津本文字較流美通暢，但與原文時有出入，二者都不是現代廣大信友期待的譯本。

為此，出版一種理想的譯本：譯文淺顯而不傷雅潔，譯義貼切而字句優美，實在是當前的要務。……

上文簡述了直至當時的天主教譯經成果，以及他們的譯經取向，然後作者提到《思高聖經》譯經工作的進展，由於尚未見其新約的出現，故此試行翻譯福音書。

以馬爾谷福音一章1至8節為例：

¹天主子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²正如先知依撒意亞書上寫的：『看！我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預備你的道路。³曠野中有呼者之聲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⁴授洗的若翰在曠野裏出現了，宣講悔改的洗禮，為得罪的寬赦。⁵猶太全境和耶路撒冷一總居民，都到他那裏去，承認自己的罪，就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禮。

⁶若翰穿着駱駝毛的衣服，腰裏束着皮帶，吃着蝗虫和野蜜。⁷他宣講說：『有一位能力比我強的，後我而來，我就俯身給他解鞋帶也不配。⁸我用水給你們授洗，他却將用聖神給你們授洗。』

12 · 狄守仁

1955年，耶穌會修士狄守仁（Édouard Petit, 1897–1985）編譯的《簡易聖經讀本》，由香港光啟出版社出版。這是附有插圖的版本，以國語選譯了新舊約的部分經文。⁵⁸

以第一章「創造世界的經過」首句為例，是譯自創世紀一章1至2節：

⁵⁸ 《簡易聖經讀本》（香港：光啟出版社，1955）。

最初，天主創造天地時，地是空虛而無定形的；黑暗籠罩了宇宙。
天主的聖神，在水面翱翔。

狄守仁的《簡易聖經讀本》是一部聖經的節略本，以淺白的語言翻譯聖經部分的章節，以後多次再版。⁵⁹

（四）思高聖經和近代中文譯經

1. 思高聖經

20 世紀中葉，意大利籍方濟會傳教士雷永明（Gabriel Maria Allegra, 1907–1976）在中國和香港先後進行中文聖經的翻譯工作。這部譯本後來被稱為《思高聖經》，譯自希伯來文和希臘文，是中國天主教首部從原文翻譯的完整中文聖經。⁶⁰

雷永明在 1931 年到湖南衡陽教區傳教，1935 年開始翻譯舊約。1939 年他由於積勞成疾，被迫返回羅馬。1941 年他去到上海，不久抵達北平，住在大使館中繼續舊約的翻譯工作，到了 1944 年完成舊約的初稿。此時他獲准召集一群主要来自北平輔仁大學的青年學者，協助譯經的工作。1945 年 8 月 2 日，在當時駐華代表蔡寧（Mario Zanin, 1890–1958）總主教的贊同及祝福下，於輔仁大學附中宿舍的庭院內，創立了思高聖經學會（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

從 1945 至 1968 年間，該會組織十多位聖經學者從事聖經翻譯工作，在 1948 年前於北平方濟堂聖經學會編譯出版聖經部分經卷的譯本。按所見的版本，當時出版的有聖詠集（1946 年）、智慧書（約伯傳、箴言、雅歌、訓道篇、智慧篇、德訓篇，1947 年）和梅瑟五書（1948 年）。

1948 年，由於中國大陸政治形勢面臨改變，思高聖經學會南遷香港，由學會眾多同工組成的翻譯小組也由北平移往香港，以致大部分工作跟著是在香港完成的。直至 1961 年間，在十多位方濟會士的合力辛勞下，該會將新舊約的各部

⁵⁹ 據悉，狄守仁和宋安德在 1955 年出版了宗徒大事錄，在 1956 年出版了羅馬書。1969 年，狄守仁與宋安德開始將他們合譯的新約分冊出版，仍由光啟出版社印行，名為《新經全集（新譯本）》。筆者未能見過這幾部譯本。關於宋安德的資料不詳，但他應該不是耶穌會的神父，而是中國天主教徒。

⁶⁰ 關於《思高聖經》的翻譯歷史，參 Arnulf Camps, O.F.M., “Father Gabriele M. Allegra; O.F.M. (1907–1976) and the 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 the First Complete Chinese Catholic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 *The Bible in Modern China*, 55–76，中譯見：《雷永明神父與中文聖經翻譯結緣》（香港：思高聖經學會，2000）。另參《思高聖經學會五十週年公開聖經講座》（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96）。

分先後翻譯，分冊出版。按所見的版本，在 1949 年後出版的有歷史書第一冊（若蘇厄書至列王紀下，1949 年）、歷史書第二冊（編年紀上至瑪加伯下，1950 年）、先知書第一冊（依撒意亞，1951 年）、先知書第二冊（耶肋米亞至厄則克耳，1952 年）、先知書第三冊（達尼爾至瑪拉基亞，1954 年）、福音書（1957 年）、新約第二冊（宗徒大事錄至希伯來書，1959 年）、福音書（重印，1960 年）、新約第三冊（雅各伯書至若望默示錄，1961 年）。

1961 年，思高聖經學會開始聖經合冊的修訂和出版計劃，新約由李士漁神父負責，而舊約則延至 1963 年底開始，整項工作於 1968 年完成。有關修訂相當仔細，並且加上每卷引言、註解、繪圖、附錄及彩色地圖多幅。全本新舊約最後在 1968 年 12 月 8 日聖母無原罪瞻禮日出版，成為當代中國天主教會最重要的中文譯本。⁶¹

以馬爾谷福音一章 1 至 8 節為例：

¹天主子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²正如先知依撒意亞書上記載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預備你的道路。³曠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³洗者若翰便在曠野裏出現，宣講悔改的洗禮，為得罪之赦。⁵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羣眾都出來，到他那裏，承認自己的罪過，在約旦河裏受他的洗。⁶若翰穿的是駱駝毛的衣服，腰間束的是皮帶，吃的是蝗蟲與野蜜。⁷他宣告說：「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後來，我連俯身解他的鞋帶也不配。⁸我以水洗你們，他卻要以聖神洗你們。」

在《思高聖經》出版之後 20 年，學會在陳維統神父領導下，把福音書部分修訂，增補了註釋，於 1989 年出版《福音袖珍本》。2005 年，思高聖經學會修訂了經文、註釋及附錄，出版了「思高聖經原著譯釋版系列」的《福音》修訂版，然後跟著依次出版聖經各卷，迄 2010 年中至《先知書中冊：耶肋米亞~厄則克耳》。

中國天主教會繼 1981 年蕭靜山的《新經全集》在北京印行後，到了 1990 年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印刷了思高版的《古經》。1993 年，出版了第一部思高版《聖經》，以後陸續出版。

⁶¹ 當時的出版報導參 Bernardino M. Bonansea, O.F.M., "First Chinese Bible from Original Texts," in *The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1969, vol. 31, 521-522；房志榮：「聖經：思高聖經學會憶釋」，載《輔仁大學神學論集》，第 2 期（1969 年），頁 267-274。

2. 台語羅馬字譯本

天主教較少中國方言的譯經成果，可以追溯的資料不多，⁶²其中現今可見者有 20 世紀中葉在台灣翻譯的台語譯本。

20 世紀 60 年代，由天主教瑪利諾修會教士和基督新教聖經學者共同合作，以台中彰化地帶的腔音翻譯新約。整項計劃從 1965 年開始進行，經過七年才完成。這項台語羅馬字版聖經計劃最早的出版成果是 1967 年的《四福音書》，它是由天主教會邀請的兩位留日的中國籍神父高積煥和陳邦鎮著手翻譯而成。他們在 1966 年 7 月完成福音書譯本的初稿，然後把校閱稿交給台灣聖經公會，邀請新教的聖經學者進行校譯。當時新教聖經學者有張德香、王成章、郭德烈和蔡仁理，各自校譯一部福音書。

在《四福音書》出版之後，再增譯新約其它書卷，並把四福音書修訂合併，於 1972 年完成，由台灣天主教會於 1972 年 8 月 31 日出版，而台灣聖經公會則於 1973 年 10 月出版新教的版本，到了 1975 年出版修訂本。一般稱這部聖經為「高陳臺灣白話聖經譯本」（或稱「紅皮聖經」〔*Âng-phoê Sèng-keng*〕）。⁶³ 這部聖經的審定委員會由天主教和新教各有五位成員組成，最後定稿交由 35 位新教和 15 位天主教學者組成的諮商委員會，由羅光總主教擔任諮商委員會天主教團主席。

這部台語譯本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共同成果，不過由於台灣政府在 1970 年代禁止台語的通行，甚至在 1975 年查禁台語和泰雅語的聖經，故此這部譯本被沒收，也影響了台語聖經的流通。直至 1990 年代解禁之後，台語聖經才有較多流傳，「紅皮聖經」也成為後來新教的《現代台語譯本》在翻譯時的參考。⁶⁴

3. 佘山修院

由 1983 年開始，中國國內天主教上海教區在金魯賢主教的主持下，以《耶路撒冷聖經》(*La Bible de Jérusalem*) 和上海徐匯總修院的《新譯福音初稿》(1953 年) 及其它中文聖經譯本為基礎，翻譯新約。上海光啟社的盧樹馨曾經協助金主

⁶² 筆者見過一部上海方言譯本的相片，是民國年間（可能是民國 29 年）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的福音書，包括瑪竇、瑪爾谷、路加和若望福音。由於圖片不清楚，故此難以判斷其翻譯概況，也找不到詳細資料可供查證。

⁶³ 《高陳臺灣話聖經譯本》(台中：聖瑪利諾會，1972)。

⁶⁴ 關於聖瑪利諾會的台語譯本，參 Albert V. Fedders, "The Four Gospels: a Taiwanese Romanized Translation," in *The Bible Translator* 1968 (19/3): 120–124。另參梁淑慧的未刊碩士論文：《台語新約聖經三種版本的臺灣社會實況化研究》(台北：新竹師院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2004)，4.1.2 章。

教，也參與了部分翻譯校對工作。1986年，上海教區出版了《新經》上（四福音）。然後，陸續出版了《宗徒大事錄》、《宗徒大事錄》註釋本、《保祿書信》、《給全體教友的信與啟示錄》等單印本。結果，經過十多年的辛勤筆耕，於1994年8月，由上海天主教教區出版了佘山修院的《聖經新約全集（注釋本）》，而這是中國天主教教會近期的譯本。⁶⁵從1995年開始，金魯賢主教投入修訂和翻譯工作，2004年重譯修訂後的《新約全集》注釋本出版。⁶⁶

4· 牧靈聖經

1998年，天主教香港教區出版了《牧靈聖經》中文版，主要翻譯人員有王凌、李玉、姚安麗、曹雪、盧媛媛等。《牧靈聖經》的原版是由法國籍的于賀（Bernard Hurault, 1917–2004）神父編寫的，1972年在智利以西班牙文成書出版，強調經文由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翻譯而成，注重使用簡潔的語言，並附上新舊約要點導論和靈修註釋。1991年，于賀到台灣學習中文，並聯絡了一批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教會人士組成翻譯組，開始翻譯中文《牧靈聖經》。整項翻譯工作歷時五年，其中譯稿在香港等待審核有18個月之久，但基本工作是在台灣及菲律賓完成的。

《牧靈聖經》在中國天主教主教團轄下的天主教教務委員會的允諾下，2000年在中國發行出版。⁶⁷

以馬爾谷福音一章1至8節為例：

¹天主子，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²正如先知依撒意亞書上記載的：「我要在你面前派遣使者，為你預備道路。³在曠野裏有聲音呼喊：預備上主的道！修直祂前面的路。」⁴若翰出現在曠野裏為人授洗。他宣講悔改的洗禮，為得罪的赦免。⁵猶太全境和耶路撒冷的全體民眾都來找他，在約旦河領受他的洗禮，并向他懺悔自己的罪過。⁶若翰身穿駱駝毛外衣，腰間束著皮帶。他吃的是蝗蟲和野蜂蜜。⁷他對民眾宣講：「在我之後，要來一位比我強的。我連俯身替他解鞋帶都不配。⁸我用水給你們授洗，祂將用聖神為你們授洗。」

⁶⁵ 佘山修院譯：《聖經新約全集》（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4）。

⁶⁶ 有關資料，參張士江：「當代中國教會的聖經推廣與福傳」，載《鼎》（144），2007年春季號。

⁶⁷ 參李子忠：「《牧靈聖經》紀實」（一、二），載《公教報》1999年2月28日、3月7日；吳岳清：「有關《牧靈聖經》一事」，載《公教報》1999年2月28日。

5 · 共同譯本

翻譯「共同譯本」是天主教與新教的譯經合作計劃。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簡稱梵二）之後，1968年6月在倫敦公佈了「各教派合作翻譯聖經的一些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s for Interconfessional Cooperation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由聯合聖經公會的執行委員會及梵蒂岡促進基督徒合一秘書處同時以五種語言發表。然後，「漢文聖經統一譯本籌備委員會」在聖經公會駐台主任賴炳炯牧師的策劃下組成。1969年6月23日召開第一次座談會，當時注意到天主教與基督教聖經中不同的人名、地名及其它固有名詞，而想從此著手，並且建議編製對照表，加註希伯來文及希臘文譯音等。1970年1月5日舉行第二次會議，是年7月4至31日在台灣東海大學舉行「聯合聖經公會東北亞區譯經研習會」，然後在1971年10月開始翻譯和校對的工作，由許牧世牧師主持，劉緒堂、陳維統、韓承良、房志榮等神父參與校閱。這項工作的成果是1975年的《新約全書現代中文譯本》的天主教版⁶⁸。不過，由於《現代中文譯本》的新舊約全書沒有次經，故此沒有天主教版。

1981年，中華民國聖經公會（今台灣聖經公會）與思高聖經學會的同工開始《共同譯本》路加福音的翻譯工作，早期集中於人名、地名及專用名詞的統一。跟著，譯經的同工在香港、台北和上海等地舉行多次會議，終於在1997年4月底完成路加福音的審訂以供付印。當時也已譯完宗徒大事錄，但未審訂。⁶⁹ 不過，最終的成果只有在2000年出版的《路加福音共同譯本》的試譯本，以及之前已經出版的若望福音，而這計劃以後並沒有進行下去。⁷⁰

6 · 偕主讀經

聖母聖心愛子會在澳門的樂仁出版社，於2010年初出版了《偕主讀經——路加福音及宗徒大事錄》，是天主教最近期的譯經成果。⁷¹ 本書在2010年7月由

⁶⁸ 《給現代人的福音》（香港：香港聖經公會，1975）。天主教版的序言由羅光主教於1974年9月24日在台北撰寫。

⁶⁹ 有關會議記錄，參「聖經合譯委員會第一（二，三，四）次會議記錄」，載《輔仁大學神學論集》，75（1988）：16, 26, 34, 44, 94, 132, 142; 78（1988）：496, 540, 552。另參房志榮：「新約全書『現代中文譯本』的來龍去脈」，載《神學論集》，第26期（1975），頁609–621；「新約全書—新譯本」，載《輔仁大學神學論集》，第30期（1976），頁593–597；「合一聖經會議在香港舉行」，載 *Tripod* 35（1986），頁27；「福傳大會前夕談譯經」，載《輔仁大學神學論集》，第74期（1988），頁529–536。

⁷⁰ 遺憾的是，筆者始終未能見過路加福音和若望福音這兩部試譯本，而只看過相關的會議記錄。

⁷¹ 《偕主讀經——路加福音及宗徒大事錄》（澳門：樂仁出版社，2010）。天主教台北總教區金毓璋神父審核，洪山川總主教准印。

河北信德社在中國印行出版。⁷²

澳門教區黎鴻昇主教在 2009 年 12 月 15 日的本書序言中說：

2008年10月5日至26日在梵蒂岡舉行了天主教主教會會議，當中主教們討論了「天主聖言在教會的生活和使命中」，與會神長們特別提及初期教會內隱修士常用的一種閱讀聖經方式：「聖言誦讀」及「偕主讀經」（Lectio Divina）。

如今，推廣閱讀聖經和生活天主聖言的「樂仁出版社」，將要按照上述閱讀聖經的方式，用中文出版聖路加記載的「福音」和「宗徒大事錄」。

本書是以「聖言誦讀」及「偕主讀經」的方式，引導讀者閱讀聖經。⁷³ 本書的譯文相近《牧靈聖經》，但不是盡然相同。以路加福音一章 1 至 4 節為例：

¹德教斐羅閣下：已有許多人將我們中間所完成的事蹟，編成了記述；²他們傳給我們的記述，來自第一批見證人和後來成為聖言的僕人。³我從頭仔細地把一切事蹟訪查之後，也決定依照次序為你寫出來，⁴讓你知道你接受的教導，都是真確的。

（五）結語

天主教的聖經翻譯，現存的成果最早可以見於清初的譯本，但對近代影響較多的譯本，都是在 19 世紀末才開始出現，包括文言和白話的譯本，雖然大多是福音書的譯本，但數量和性質都甚為豐富。

從上述的縱覽可見，這些譯本主要是福音書和宗徒大事錄，大多由華北地區和香港的教士所譯，其中文言和白話（即官話、國語或普通話）譯本均有。在翻譯的取向上，既有較為文學性的嘗試，也有以牧靈為取向的成果。

天主教中文聖經較為傾向以文言的語體翻譯，直至 20 世紀中葉，仍然有文言譯本的出現。至於白話的譯本相對較少和較遲才出現，然而天主教首部新約（蕭靜山譯本）和完整聖經（《思高聖經》）都是以此翻譯，顯示它作為中國通用語言

⁷² 《偕主讀經——路加福音及宗徒大事錄》（河北：信德社，2010）。

⁷³ 有關介紹，參房志榮：「偕主讀經 Lectio Divina 釋意」，載《偕主讀經——路加福音及宗徒大事錄》，頁 ix-x。

的性質，為天主教譯經者所接受。相對之下，方言聖經譯本在中國天主教會的比重就不大（起碼相對新教有大量方言聖經的情況）。

至於翻譯聖經所據的原文，在《思高聖經》之前，中文聖經譯本大多是譯自拉丁文通行本，其中蕭靜山的新約譯本是按照希臘原文加以修訂，而李山甫等人的譯本和上海耶穌會徐匯總修院的新約譯本也強調參考希臘文的經文。蕭靜山的新約譯本，也是 20 世紀上半葉最受歡迎的天主教中文聖經，影響深遠。

同樣地，《思高聖經》是以舊約希伯來文和新約希臘文為翻譯的基礎，具有相當的意義。這部聖經是梵二之後最早期的中文譯經成果。不論是在歷史或牧靈上，都具有相當的價值。⁷⁴ 在《思高聖經》之後，天主教翻譯聖經的活力仍然持續，期盼有更多成果湧現。

至於天主教與新教的中文聖經翻譯，不論是歷史方面，還是取向方面，其可供比較和研究之處甚多，但過往學者較少注意兩者之間的關聯。⁷⁵ 歷史文獻清楚顯示，天主教在清初的部分新約譯本，影響了新教最早參與譯經的傳教士，而在梵二之後，天主教與新教在譯經上也有合作的機會。儘管仍然未有具體的成果，然而兩者在譯經上是否可有更多交流之處，不論是在歷史研究或實務上，都有值得深思的空間。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translation of Catholic Chinese Bible, especially the publication results of the Catholic Chinese Bibles, Testaments and Portions in the last century.

⁷⁴ 關於梵二論聖經翻譯的文件，參房志榮：「梵二與聖經」，載《神思》，第 68 期，頁 75–89。另參房志榮：「從梵二《啟示憲章》看中文聖經的發展」，載《神思》，第四十五期，2000 年 5 月，頁 1–15。

⁷⁵ 這方面的論述，可參房志榮：《天主教與基督教聖經的異同》（台北：聞道，1987）。